

《東華漢學》第 40 期；113-156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24 年 12 月

## 明清小說與筆記之宦官生祠敘事研究

謝佳滢\*

### 【摘要】

歷來研究明清小說的宦官敘事，多聚焦於明末魏忠賢及其禍國殃民的權宦事蹟與形象，而「立生祠」的情節被視為形塑宦官負面形象的方式之一。但明代劉瑾、王堂、孫隆、劉璟等權宦已有生祠，隨著宦官勢力越加龐大，生祠數量也增多，藉此傳達朝廷之外的權威，故宦官生祠敘事有其重要性，本文聚焦於明清小說並參照筆記，探究宦官生祠敘事之呈現、演變及其意義。

首先，「生祠賜額與從祀孔廟的意圖」呈現出「政統與道統話語權之爭」，魏祠以前的宦官「帝王賜額」名稱較少被記載，而《斥奸書》、《禱杌閑評》、《天雨花》中的魏祠祠額為帝王所賜，具有「政統」合法性，且多以仁德等儒家德目命名，以彰顯「賢德」之「賢宦」形象，及對於國家之貢獻和地方百姓的「恩惠」。至於魏祠「從祀孔廟的意圖」則開啟立宦官生祠於孔廟和太學旁之風氣，宦官取得儒家「道統」之話

---

\*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後研究員、致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部兼任助理教授。

語權，且致力於使其形象「化奸為賢」；而《警世陰陽夢》、《斥奸書》、《剿闖通俗小說》、《天雨花》中之宦官生祠則多選址於都城、西湖等名勝，以達到宣揚「權宦」勢力之效果。

其次，「生祠塑像、喜容與建築」神化了明代宦官之形象，正史中「權宦」因耗費鉅資立生祠、建築僭越禮制而飽受批評，故多為「奸／惡宦」的負面形象，小說與筆記中的宦官生祠存在的時間不長，多隨著其失勢而被毀，但卻可能因對於當地有貢獻之「賢宦」形象，而保留塑像於生祠改建成的建築中；從《斥奸書》、《禱机閑評》、《鼓掌絕塵》、《鎮海春秋》可見生祠塑像服飾、配件僭用帝王儀制，反映出作者批判「權宦」的意圖；《斥奸書》與《天雨花》延續並強化「奸宦」形象，指出生祠建築與擺設僭用帝王儀制，是導致帝王駕崩和明亡的重要原因。清代在明代小說的生祠敘事基礎上增加細節，反映出中央官員與地方仕宦對於「權宦」是否有功於地方的不同態度，宦官與地方仕宦也共同形塑出游移於賢宦、奸／惡宦之形象，故梳理明清小說與筆記中的宦官生祠敘事之呈現與演變，可理解明清宦官敘事的多元性及意義。

**關鍵字：**宦官敘事、魏忠賢、生祠、塑像、明清小說

## 一、前言

生祠作為表彰官員對於國家之功勞、貢獻及百姓感戴的重要象徵，亦為掌權之宦官所利用，洪武17年（1387）因正式設立司禮監——即內廷管理宦官與宮內事務的「十二監」之一，宦官掌管機要，並能代理皇帝做出重要政策<sup>1</sup>、影響帝王立廢和立儲，故宦官之禍特甚。許多官員或欲結黨營私，或畏懼其勢，故上疏建議替宦官立生祠，生祠或經皇帝敕立、或由地方官員自立，並在生祠中供奉宦官塑像、畫像等。明武宗時的劉瑾（1451-1510）是最早立生祠的宦官，接著有正德年間的劉璟，王堂；神宗萬曆年間的孫隆、黨存仁等，而明熹宗時的「九千歲」魏忠賢（1568-1627）擁有最多的欽賜勅建生祠<sup>2</sup>。自天啟6年（1626）6月浙江巡撫潘汝楨在西湖畔建魏祠，熹宗賜額「普德」，至崇禎2年（1629）思宗下令毀魏祠為止，其生祠「幾遍天下」<sup>3</sup>；而位於魏忠賢祖籍地河北肅寧縣大莊村的福田寺由宦官監工，是天啟年間興建規格較高且規模宏大的生祠<sup>4</sup>，反映出權宦的權傾一時。而宦官生祠被視為明代宦官專權的腐敗象徵<sup>5</sup>，較具代表性的批評如《明史·閹黨》「閹鳴泰」：「每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少者數萬，剝民財，侵公帑，伐樹木無算」<sup>6</sup>，批判為立宦

<sup>1</sup> 日·三田村泰助，吳昊陽譯，《宦官：側近政治的構造》（宦官：側近政治の構造）（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頁182-185。

<sup>2</sup> 苗棣統計各地之魏忠賢生祠至少有92座，遍布30縣。苗棣，《魏忠賢專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頁165。

<sup>3</sup> 清·張廷玉等，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四史·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二二，本紀第22〈熹宗〉，頁5267。

<sup>4</sup> 梁紀想，〈欽賜重修福田寺碑記〉及魏忠賢生祠，《文物春秋》第4期（2006.8），頁70。

<sup>5</sup> 杜婉言，《佞幸：中國宦官與中國政治》（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頁267-270。余華青，《中國宦官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58。

<sup>6</sup> 清·張廷玉等，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四史·明史》，卷三零六，列傳第194〈閹黨·閹鳴泰〉，頁5268。

官生祠而勞民傷財，施珊珊指出明代宦官渴望被立生祠，是為借助朝廷之外的權威傳達有利的政治信息<sup>7</sup>。

明清文獻中的宦官多為負面形象，少數具有正面形象的宦官則有明初洪武年被視為「賢宦」典範的雲奇<sup>8</sup>、明成祖時的鄭和（1371-1433）等，明清以宦官為主要人物的小說較前朝多，乃因明代宦官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提高，可掌權專政、與皇帝結盟，明末清初描寫魏忠賢事蹟的時事小說即為典型，描寫魏忠賢的小說數量和篇幅較多，乃因明代天啟年間東林黨爭牽涉人事頗廣，且留下較多野史、筆記等相關文本，小說敘事多在史實的基礎上另做延伸與發揮，如《聖烈傳》卷2的陸萬齡奏疏節縮自明末朱長祚之史料筆記《玉鏡新譚》卷7〈建祠〉<sup>9</sup>，由於小說與史傳、筆記的關係密切，故參照相關文本，有助於掘發明清小說中宦官生祠敘事之特色、意義與價值。

明清小說的宦官生祠敘事背景多集中於明代，研究者多關注魏忠賢小說中宦官生祠敘事的負面象徵意涵，如羅元信分析《警世陰陽夢》、《斥奸書》、《聖烈傳》、《禱杌閑評》、《鼓掌絕塵》之「林鈺拒建魏闈生祠」情節，指出林鈺反對陸萬齡建魏祠之上書，是小說中抗拒媚闈劣行的代表性角色<sup>10</sup>，但研究重點並非是魏忠賢；郭書瑄研究《禱杌閑評》中「士風敗壞，諂附建祠」的宦官專權書寫，藉由形塑魏忠賢進宮前的幫閒與市井無賴形象，「去神化」其在造祠風氣中營造的神化色彩，反映出小說作者致力於探討明亡的重要因素<sup>11</sup>，而向楷分析立宦官生祠情節的真

<sup>7</sup> 美·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邵長財譯，《小天命：生祠與明代政治》（*Shrines to Living Men in the Ming Political Cosmo*）（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2），頁 275。

<sup>8</sup> 明·唐樞，《國琛集》（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下卷，頁 161。

<sup>9</sup> 羅元信，〈〈林祭酒拂衣帝里〉——關於「林鈺罷官」的史實、人物與文學作品〉，收入陳益源主編，《2019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門：金門縣政府文化局，2019），頁 80。

<sup>10</sup> 羅元信，〈〈林祭酒拂衣帝里〉——關於「林鈺罷官」的史實、人物與文學作品〉，收入陳益源主編，《2019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71、120。

<sup>11</sup> 郭書瑄，《明末清初「魏忠賢」小說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

實性，總結明亡是因明末宦官與朝中奸佞勾聯、禍國殃民<sup>12</sup>。齊裕焜與陳惠琴、莎日娜則分別指出《鼓掌絕塵》、《斥奸書》立生祠的寫實情節，呈現出魏忠賢喜人拍馬屁的形象與群臣媚奸闖黨<sup>13</sup>；李惠儀、鮑震培分析《天雨花》26回左維明怒毀魏祠之情節，是以家庭內部的秩序反襯國勢衰頹，對比出將亡國的預感<sup>14</sup>。上述研究多指出小說中立魏忠賢生祠之情節，反映出其權傾一時的聲勢，並形塑出宦官的負面形象，而較未提及其他宦官的生祠敘事，一則因為小說文本較少相關敘述，二則因為其他宦官的生祠數量較魏祠少得多，且隨著宦官失勢而被拆毀，或改為其他用途，保存年代不長。值得注意的是，此類敘事多被視為形塑宦官形象的重要情節，因此明清小說之宦官生祠敘事特色、意義與價值、宦官形象的多面性等，尚有可深入探究之空間。

而本文討論的明清小說，主要有明末長安道人國清《警世陰陽夢》（崇禎元年成書，1628）；陸雲龍署名吳越草莽臣所作之《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崇禎元年八月成書，全稱《崢嶸館評定出像通俗演義魏忠賢小說斥奸書》，以下簡稱《斥奸書》）；西湖義士《皇明中興聖烈傳》（崇禎初年成書，又名《魏忠賢軼事》，以下簡稱《聖烈傳》）；《檣杌閑評》（崇禎3年後成書，1630，全稱《檣杌閑評全傳》，又名《檣杌閑評明珠緣》、《明珠緣》）；明末古吳金木散人《鼓掌絕塵》（崇禎4年成書，1631，全稱《新鐫出像批評通俗小說鼓掌絕塵》）。另有較少人討論的西吳懶道人《勦闖通俗小說》（弘光元年成書，1645，又名《勦闖小史》、《勦闖孤忠小說》、《勦闖小說》、《忠孝傳》）、

---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 63-64。

<sup>12</sup> 向楷，《世情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頁 219。

<sup>13</sup> 齊裕焜、陳惠琴，《諷刺小說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頁 161。莎日娜，《明清之際章回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 84。

<sup>14</sup> 李惠儀、李惠儀、許明德譯，《明清文學中的女子與國難》（*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the Late-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2），頁 175。鮑震培，《清代女作家彈詞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頁 167。

吳門嘯客《鎮海春秋》（崇禎3年至17年成書，1630-1644）；明末清初江左樵子《樵史通俗演義》（順治年間成書，又稱《樵史演義》，以下簡稱《樵史》）、陶貞懷《天雨花》（成於順治8年以前，1651；嘉慶9年刻本，1804）等。並參照描寫其他宦官生祠的筆記，如明末清初談遷《國權》的王堂生祠、明代張岱《西湖夢尋》的孫隆生祠、清代甘熙《白下瑣言》的劉瑾生祠等，以更全面性地理解正史以外的宦官生祠敘事。

從上述文本，可觀察明清小說和筆記中魏忠賢以前的宦官生祠敘事（如王堂、劉瑾、孫隆等）的初現，如何建構、演變至宦官生祠敘事之集大成，並共同形塑出宦官的不同形象，探究明清小說中對於宦官生祠敘事之特色及意義，以下分為「生祠賜額與從祀孔廟：政統與道統話語權之爭」、「生祠塑像、喜容與建築：賢／奸宦形象之神化」兩部分，論述宦官生祠之立祠、立像、從祀意圖與建築，如何反映出中央／地方、官方／民間、文人／百姓等不同群體對於「宦官生祠」的認知與理解，以便更脈絡化地理解明清筆記與小說中的宦官生祠敘事之意義與重要性。

## 二、生祠賜額與從祀孔廟的意圖：政統與道統話語權之爭

宦官生祠因逾越禮制，故為歷來紀載中反對者批判立祠的重要理由，施珊珊便指出魏忠賢及其黨羽與東林黨分別立生祠互相抗衡，是為了爭奪政治上的話語權，故需製造百姓和地方官認可其合法性之「小天命」<sup>15</sup>，可見生祠對於展示宦官之權力有重要作用。具體而言，「生祠賜額」之命名多與儒家德目相關，既讚揚權宦之品行崇高，亦彰顯其對於風教地方與國家之貢獻，代表生祠的政統合法性；而權宦「從祀孔廟

<sup>15</sup> 美·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邵長財譯，《小天命：生祠與明代政治》（*Shrines to Living Men in the Ming Political Cosmo*），頁314-315。

的意圖」則始於魏忠賢生祠，顯見權宦爭奪與繼承儒家道統合法性之企圖。以下分為「帝王賜額：彰顯賢德」、「從祀孔廟的意圖：化奸為賢」兩部分，討論宦官如何藉由「帝王賜額」與「意圖從祀孔廟」的逾越禮制之舉，爭奪政統與道統之話語權。

### （一）帝王賜額：彰顯賢德

#### 1. 劉瑾（約1451-1510，本姓談，陝西興平人）

在魏忠賢以前的明代宦官生祠數量較少，故題額名稱較少被記載。杜婉言已指出劉璟、王堂、孫隆、魏忠賢等還有生祠額，于經香山寺賜祠額外，還給護敕<sup>16</sup>，正史記載在明代中期之前已有宦官生祠，如明武宗回覆工部奏劾宦官劉瑾十三事道：「內官建祠造墳，亦先朝舊例」<sup>17</sup>，可見在劉瑾之前已有宦官立生祠；《明武宗實錄》則紀載其生祠位於北京朝陽門外：「宜差官將瑾朝陽門外祠堂，拆毀還官」<sup>18</sup>，此生祠在正德4年（1509）立於供奉玄天大帝之玄明宮（又稱玄真觀、元真觀）內<sup>19</sup>，外觀富麗堂皇且有帝王賜額、護敕。除了王廷相作於嘉靖年間（元年至23年，1522-1544）的〈西山行〉詩<sup>20</sup>，陳洪謨於嘉靖初年成書的史料筆記《繼世紀聞》：「畢真輩之敕，并近日內官賜祠額護敕，皆瑾與內閣李、焦輩創為之」<sup>21</sup>、明末李贄作人物史傳《續藏書》亦載：「正德間，

<sup>16</sup> 杜婉言，《倭幸：中國宦官與中國政治》，頁125。

<sup>17</sup> 明·王世貞，魏連科點校，《弇山堂別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九五，〈中官考六〉，頁13。

<sup>18</sup> 明·費宏等修，《明武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六七，正德5年9月8日辛酉條，頁1476；〈明武宗實錄校勘記〉，卷六七，頁255。

<sup>19</sup> 何孝榮，《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京：南開大學出版社，2007），頁446。

<sup>20</sup> 明·王廷相〈西山行〉：「已請至尊親賜額，更為諸僧求護敕。東林畫壁千步廊，西林蓮臺七寶妝。南庵日夜低浮圖，北寺虹霓垂石梁。金銀何等委溝壑，夜夜中天生寶光。」《王廷相集·王氏家藏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一三，頁194-195。

<sup>21</sup> 明·陳洪謨，《繼世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二，頁82。

內官獲生祠額護勅，皆劉瑾分付內閣李東陽、楊廷和創為之」<sup>22</sup>，皆敘述正德年間武宗賜額予劉瑾生祠，並頒布具有保護功能的敕諭<sup>23</sup>，可見宦官地位之高；並將劉瑾生祠祠額與護勅，歸為與其交好之內閣李東陽、次輔焦芳請明武宗所賜，由李東陽、楊廷和協助立祠。正德5年(1510)8月劉瑾失勢後<sup>24</sup>，護勅亦失去其保護作用，玄明宮之劉瑾生祠設立不久即被毀，其祠額名稱未見於紀載。

而道光27年(1847)成書的甘熙《白下瑣言》卷2〈劉瑾生祠〉，則紀載另一座劉瑾生祠和塑像，位於南京雨花臺西北的普德寺內：

聚寶門外普德寺，明內監劉瑾嘗修之，寺內有瑾像，僧諱言之，指為伽藍神。<sup>25</sup>

普德寺始建於南朝梁武帝天監年間(502-519)<sup>26</sup>，由於劉瑾曾重修此寺，故寺內奉有其塑像，表達對於劉瑾的感謝，但從「僧諱言之」的反應，可見清人對於劉瑾的印象不佳，故寺僧諱言廟內奉有劉瑾塑像，而指其為佛寺守護神、護法神<sup>27</sup>，暗示劉瑾重修普德寺之功德正如護法伽藍。雖然南京普德寺的劉瑾生祠未見於其他典籍中，但《白下瑣言》被視為

<sup>22</sup> 明·李贄，劉幼生編，《李贄文集·續藏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內閣輔臣》（冊10），卷一一，《李贄文集》，〈太傅王文恪公鑿〉，頁243。

<sup>23</sup> 陳時龍，〈明代的敕和敕諭〉，《故宮學刊》第14輯（2006.8），頁176。

<sup>24</sup> 劉瑾於弘治18年(1505)武宗即位後掌權，先執掌鐘鼓司，後升為內官監掌印太監；正德元年初受命掌控京師三大營之「三千營」，又升任司禮監掌印太監，時人稱為「立皇帝」；正德5年4月寧夏安化王之亂（又稱朱真鐸叛亂）被平定後，太監張永與右都御史楊一清聯手呈上劉瑾隱匿的安化王檄文，提及劉瑾圖謀不軌，劉瑾遂被捕抄家，坐實其謀逆罪狀，8月25日被凌遲處死。清·張廷玉等，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四史·明史》，卷三零四，列傳第192，〈劉瑾〉，頁5213-5217。

<sup>25</sup> 清·甘熙，《白下瑣言》（臺北：廣文書局，1970），卷二，頁20。以下引文隨文附上頁碼，不另作註。

<sup>26</sup> 盧海鳴、楊新華，《南京明清建築》（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227。

<sup>27</sup> 明代南京寺廟殿堂配置有「左伽藍，右祖師」之說法，在大雄寶殿前，往往左有伽藍殿、右有祖師殿。何孝榮，《明代南京寺院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164。

蒐羅考證南京掌故甚詳的重要筆記，內容包含山水脈絡、社會經濟、文化生活、鄉里風俗、名人遺聞軼事等，且甘熙曾編撰多種南京方誌著述<sup>28</sup>，故此則記載應有其可信度。由上述可見，劉瑾至少有兩座位於兩京之生祠，且其南京生祠塑像在毀祠後仍被保留一段時間。

## 2. 劉璟（1459-1531，字世明）

劉璟於正德元年（1506）任鎮守浙江中官，其生祠「感惠祠」建於正德6年秋（1511）：「得旨建祠，敕額『感惠』，下浙江布政司施行」<sup>29</sup>，祠額名稱應出於唐代孫過庭《書譜》五合之二：「感惠循知」<sup>30</sup>，本指酬謝知己，或以書法表達親朋對自己之恩惠，此處則轉化為表達地方士民對於劉璟德政的感謝，此祠於7年冬（1512）落成，正德10年初（1515）劉璟離任並改鎮兩廣前，杭州地方士民為其修建生祠、編刊繪圖和德政詩文集（作於正德7年冬至8年，1512-1513）為《萃美錄》；後劉璟總鎮兩廣離任之際，地方士民亦建生祠，並由兩廣三司及梧州、廣州等地官紳編撰詩文集《兩廣去思錄》（作於正德11年2月至4月，7月刊於杭州，1516），描述其德行、才華、廉潔及風教之貢獻。吳兆豐指出在權幸當道、政治風雲詭譎的正德年間，彙集與刊行二書是劉璟刻意施惠於民、謀求惠政形象的結果，亦是明中後期地方士紳褒揚、傳播賢良鎮守中官的美政，塑造和樹立鎮守中官模範，以循吏文化模塑鎮守中官典範，更有浙江、兩廣地方官民認可與宣示「循良」鎮守中官，以達到彰善去惡、勸世模範之教化目的<sup>31</sup>。

<sup>28</sup> 李孝悌，《明清以降宗教城市與啟蒙》（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9），頁110。

<sup>29</sup> 明·《萃美錄》，卷一，〈奏疏勘合一道〉（明正德年間刻本），頁1a-4b。

<sup>30</sup> 唐·孫過庭，朱建新箋證，《書譜箋證》（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頁44。

<sup>31</sup> 吳兆豐，《有教無類：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動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頁274。

### 3. 王堂（字時升）

至於《明武宗實錄》紀載正德年間的內官監太監王堂生祠亦有賜額：「賜鎮守浙江太監王堂生祠額，并護勅」<sup>32</sup>，正德9年（1514）王堂任浙江市舶太監，並代劉璟為浙江鎮守太監，正德13年（1518）武宗批准建造其生祠並賜額<sup>33</sup>，正德14年（1519）出任兩廣鎮守太監。而王世貞成書於萬曆18年（1590）之《弇山堂別集·中官考七》，則記載北京西山之王堂生祠之確切位置，及王堂仿效劉璟之目的：

十三年，賜鎮守浙江太監王堂生祠額并護敕。先是，太監劉璟諷杭民為己請建生祠，既許之，堂襲璟故智，復諷杭民以請，且盛陳在浙有靖盜安民功，下禮部覆奏，以見任立碑，律令所禁，不可。詔特許之。堂既得請，乃擇西山勝地，大興土木，與璟祠相望，民居古墓，多罹毀掘者。嘉靖初，祠皆沒官，杭人快之。<sup>34</sup>

「太監劉璟諷杭民為己請建生祠」是指正德6年杭州地方官民請立西湖畔之劉璟感惠祠，此因劉璟受錢塘百姓愛戴，故為立生祠<sup>35</sup>；而王堂仿照其法，其生祠「與璟祠相望」，是因二人曾先後歷任浙江與兩廣鎮守太監的相近宦途，吳兆豐指出歌頌劉璟德政之《兩廣去思錄》有規箴王堂之用意<sup>36</sup>，故王堂立祠應有粉飾與地方官紳之緊張關係，及建立循吏和中官「賢鎮守」典範自我形象之意圖，劉璟與王堂之西湖生祠約於正

<sup>32</sup> 明·費宏等修，《明武宗實錄》，卷一五八，〈正德13年正月2日〉，頁3020。

<sup>33</sup> 清·張廷玉等，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四史·明史》，卷一九一，列傳第79，〈毛澄〉：「中官王堂鎮浙江，請建生祠。」，頁3366。

<sup>34</sup> 明·王世貞，魏連科點校，《弇山堂別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九六，〈中官考七〉，頁1837。

<sup>35</sup> 明·韓邦奇，魏冬點校整理，《韓邦奇集·苑洛集》（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卷一一，〈劉中鎮萃美〉：「湖山奇處起生祠，飛碧流丹百尺危。穹碑高碣鑿瑤石，雄文大字論功績。復有錢塘百萬民，黃童白叟傳俱真。」，頁1555。

<sup>36</sup> 吳兆豐，《有教無類：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動研究》，頁273。

德13年後並立數年，或許代表了王堂視劉璟為中官典範，故與其祠遙遙相對，也回應了《兩廣去思錄》的規箴之意。

正德14年（1519）王堂出任兩廣鎮守太監，正德16年（1521）7月被戶科給事中易瓚等人上奏彈劾，同年調回北京，王堂生祠雖有武宗護敕，但只存在約五年左右（正德13年至嘉靖初年），嘉靖初年便被沒官。談遷於順治13年（1656）成書之《國權》亦提及位於西山的王堂生祠：

賜鎮守浙江太監王堂生祠，并護敕。堂卜地西山，多毀民居古墓。嘉靖初，祠沒官，杭人快之。<sup>37</sup>

西山是明代北京居民的旅遊勝地，也是明代宦官修建佛寺的主要地點之一，此處的宦佛教寺院數量甚至超越皇家佛寺<sup>38</sup>，故其生祠設於此處，或許是為了昭示權宦勢力之大，而從其生祠沒官後「杭人快之」之反應，可見王堂生祠並不受明人歡迎，就目前研究所見，其祠額名稱亦未見於紀載中。

#### 4. 孫隆（1530-1609，字東瀛，順天府三河縣人）

孫隆於嘉靖、萬曆、隆慶年間曾任司禮監太監，萬曆4年（1576）5月初任提督蘇杭織造，並兼任蘇松常鎮四府稅監，明末季嬰《西湖手鏡·湖堤孤山敘勝》紀載孫隆生祠建於孤山（西湖北山棲霞嶺的支脈）：

孫公祠：士民創建，以祀司禮監東瀛孫公隆。萬曆間，公以織監駐杭州，先後幾二十年。修築堤橋，增布花柳。城內、城外、南北山間，荒祠廢殿，到處鼎新。可謂湖山之功臣，熙朝〔案：振興朝政〕所僅見者。<sup>39</sup>

此生祠為杭州士民建於萬曆年間，因其任提督蘇杭織造27年（萬曆4年至9年、14年至36年，1586-1608），並出資修築當地建設，故被當地人

<sup>37</sup> 明·談遷，張宗祥校點，《國權》（北京：中華書局，1958），卷五十，〈武宗正德十三年〉，頁3141。

<sup>38</sup> 何孝榮，《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頁662。

<sup>39</sup> 明·季嬰，《西湖手鏡·湖堤孤山敘勝》，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第95冊，頁347下。

譽為「湖山之功臣」，士民替孫隆建生祠是為了崇其寬簡之政與賑濟之舉<sup>40</sup>。而孤山為明代西湖之旅遊勝地，立祠於此也反映出士民感念其建設西湖，故選擇此觀賞湖山景色的首選之地<sup>41</sup>，西湖作為宦官生祠的熱門地點（如劉璟、孫隆），後來也成為立魏忠賢生祠的地點之一。

清代孫公祠改為佛庵，孫隆塑像被藏於佛龕之後，明末張岱《西湖夢尋·十錦塘》便為之抱不平：

孫太監生祠，背山面湖，頗極壯麗。近為盧太監捨以供佛，改名盧舍庵，而以孫東瀛像置之佛龕之後。孫太監以數十萬金錢裝塑西湖，……乃使其遺像不得一見湖光山色，幽囚面壁，見之大為鯁悶。<sup>42</sup>

張岱曾見孫隆祠之壯麗盛況，順治年間太監盧九德（字雙泉，江蘇揚州江都人，崇禎時期宦官、弘光時期的京營提督太監，順治2年10月時為杭州織造太監）將孫公祠改為盧舍庵（又名盧舍禪院）<sup>43</sup>，庵內仍供奉孫隆塑像。其塑像得以保留或因改建者盧九德同為太監，且孫隆與寺廟之修建有密切關係<sup>44</sup>，和重修普德祠之劉瑾同樣具備對於當地之貢獻，故二人之生祠被毀後仍能保留塑像，以供後人瞻仰。

<sup>40</sup> 吳兆豐，《有教無類：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動研究》，頁285、190。

<sup>41</sup> 元·李祁〈巢居閣記〉：「錢塘之勝在西湖，西湖之奇在孤山。」收入清·王復禮，《御覽孤山志》第3集（光緒7年〔1881〕錢塘丁氏刻本），頁30。

<sup>42</sup> 明·張岱，馬興榮點校，《西湖夢尋》（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三，〈西湖中路·十錦塘〉，頁162。

<sup>43</sup> 清·鄭澧修，《乾隆杭州府志》（乾隆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卷三十，〈寺觀〉「報恩院」條：「在白沙堤之西，舊名盧舍庵（《西湖志》）。萬曆間織造孫隆有德于杭郡，人建祠祀之。國朝順治己丑盧九德修造，立柵水中，禁人捕捉，以為西湖放生之所，遂名盧舍。康熙五十五年改建，更名報恩院。（《錢塘縣志》）」，頁25。

<sup>44</sup> 陳玉女指出，明代宦官與僧人之來源與出身高度相似，二者有互相依存與合作之關係：寺田為二者共同圖求的對象，宦官建蓋寺院，並為寺院提請賜額；僧人被宦官提拔為僧官，故明代各衙門的宦官皆積極建蓋寺院。陳玉女，《明代二十四衙門宦官與北京佛教》（臺北：如聞出版社，2001），頁237。

5. 魏忠賢（1568-1627，原名魏四，進宮後改名李進忠，移宮案後改回魏姓，天啟帝賜名忠賢，字完吾，北直隸肅寧縣人）

上述明代宦官中，僅劉璟感惠祠之祠額名稱見於記載，而天啟年間魏忠賢生祠因數量眾多，題額名稱也記錄詳細，從天啟7年五月天啟皇帝駕崩至魏忠賢垮臺的一年多裡，全國各地耗費鉅資建魏忠賢生祠，《明熹宗實錄》天啟4年4月21日載魏忠賢自建生祠：「司禮太監王體乾、魏忠賢各乞祠額」<sup>45</sup>。關於魏祠賜額名稱的紀載，最早的是天啟6年（1626）6月浙江巡撫潘汝楨在西湖畔建魏祠，熹宗賜額「普德」<sup>46</sup>，《明史紀事本末·魏忠賢亂政》指出此祠的確切地點：「祠建於西湖之麓，居關壯繆、岳武穆祠之中，備極壯麗」<sup>47</sup>，描述其建築壯麗。

值得注意的是，西湖魏祠位於關廟與岳飛祠之中，岳武穆祠位於杭州西湖畔棲霞嶺南麓，亦為岳飛墓之所在地；而岳廟左則有關廟，地勢與岳祠相連，萬曆年間翰林院檢討繆昌期（東林七賢之一，1562-1626年）為其題〈關帝廟聯〉：「德必有隣，把臂呼岳家父子；忠能擇主，鼎足定漢室君臣」<sup>48</sup>，繆昌期因替東林黨楊漣代草彈劾魏忠賢的上疏，而遭魏忠賢忌恨，後因汪文言案而被捕入獄，慘死獄中。西湖魏祠建於東林黨繆昌期所題的關廟與岳廟之間，可能代表了魏忠賢與東林黨勢力抗衡，及其欲自我彰顯「忠」和「德」的意圖；而位於魏祠另一側的關羽廟，是因16、17世紀之交，文人崇拜關羽，使其在明代以降形成文人

<sup>45</sup> 明·溫體仁等撰，《大明熹宗愍皇帝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卷四一，〈天啟4年4月21日〉，頁2332。

<sup>46</sup> 清·張廷玉等，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四史·明史》，卷三零六，列傳第194，〈閹黨·閻鳴泰〉「生祠之建」條：「生祠之建，始於潘汝楨。汝楨巡撫浙江，徇機戶請，建祠西湖。六年六月疏聞於朝，詔賜名『普德』。自是，諸方效尤，幾遍天下。」，頁5267。

<sup>47</sup>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2015），卷七一，〈魏忠賢亂政〉，頁1157。

<sup>48</sup> 清·梁章鉅，《楹聯叢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卷三，〈廟祀上〉，頁29。

信仰之神祇，具有等同於文聖孔子之武聖地位<sup>49</sup>，與下一小節「從祀孔廟的意圖：化奸為賢」論小說敘事中魏忠賢配享文廟，是為了搶奪儒家道統話語權，有異曲同工之妙。

此後至魏忠賢自盡前的天啟7年（1627）12月，各地風行興建魏祠，直至崇禎元年（1628）11月下令拆毀魏祠前，多數魏祠只存在兩年半以內，典籍中有祠額名稱紀載的尚有如：江蘇淮安瞻德祠、蘇州普惠祠、揚州沾恩祠；松江府德馨祠；山西河東褒勳祠；河南戴德祠、成德祠；山西報功祠、大同嘉德祠；山東登萊報德祠、濟寧昭德祠；四川房山顯德祠；安徽徽州崇德祠；湖北太和山（武當山）昭德祠等<sup>50</sup>。從各地祠額之命名，可見恩、惠、仁、德、功、勳是常用的關鍵字，「恩」、「惠」強調魏忠賢執政對於國家、地方與百姓的貢獻，故《櫛杌閑評》第42回「建生祠眾機戶作俑」：「你們感祖爺的恩德，何不代祖爺建個生祠，與萬人瞻仰」<sup>51</sup>；「功」、「勳」則強調其功在國家，以呼應替魏忠賢建生祠的理由，小說也多延用史傳中的建祠理由，如《警世陰陽夢》第26回〈建祠伏兵〉：「說老祖爺有許多的功德在世間，當建祠祝釐」<sup>52</sup>；而「仁」實踐於政治上，則是以「仁心」為基礎的「仁政」，孔子以「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為仁的最高境界，孟子則鼓勵國君以「不忍人之心」推行仁政<sup>53</sup>；而以「仁」命名魏祠題額，則代表其得以隨意運用儒家尊崇的價值，如清代《天雨花》第26回「左丞相怒毀隆仁祠」中武昌隆仁

<sup>49</sup> 荷·田海（Barend J. Ter Haar），王健等譯，《關羽：由凡入神的歷史與想像》（*Guan Yu: The Religious Afterlife of a Failed Hero*）（北京：新星出版社，2022），頁266-267。

<sup>50</sup>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賢亂政〉，頁1157-1158。

<sup>51</sup> 明·佚名，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櫛杌閑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清木刻本），第42回，頁1407-1408。以下引文隨文附上頁碼，不另作註。

<sup>52</sup> 明·長安道人國清編次，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警世陰陽夢》，第26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大連圖書館藏崇禎元年〔1628〕刊本影印），頁431。以下引文隨文附上頁碼，不另作註。

<sup>53</sup> 黃俊傑，《東亞儒家仁學史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頁462、149。

祠之賜額描金字，並藉由姚宗文解釋命名之意為：「隆乃高大尊崇之意，仁便是仁德之仁」<sup>54</sup>，反映出官員諂媚魏忠賢對於國家與地方之貢獻。

除了官員所立的各地魏祠，位於都城北京的魏祠數量最多，如蘆溝橋隆恩祠、昌平鎮彰德祠、密雲崇功祠、通州懷仁祠、通州崇仁祠；北京九門南面之前三門，則有崇文門內廣仁祠、宣武門外茂勳祠等，其中上林苑監設立的魏祠另立有「牌坊」，文秉於明亡後作《先撥志始·魏忠賢建祠》（又名《先揆志始》、《先跋志始》），指出此乃始於上林苑監丞張永祚上疏：

上林苑監丞張永祚，疏請為廠臣建祠、建坊。有旨，良牧署祠名「存仁」，坊名「功高冊府」〔案：文壇、翰苑〕；嘉蔬署祠名「洽恩」，坊名「洪恩流芳」；林衡署祠名「永愛」，坊名「一代元勳」。<sup>55</sup>

上林苑監始置於永樂5年（1407），管理北京附近苑地的御花園、畜牧場與菜圃，宣德10年（1435）定為良牧署（牧養牛、羊、豬）、蕃育署、林衡署（種植果樹花木）、嘉蔬署（蒔藝瓜菜），正德年間增設監督內臣（含總督、僉書、監工等官員）共99員，分為58營，後因產生了侵奪公私土地之弊，嘉靖元年（1522）又革除80員，可見正德年間的上林苑監為宦官所掌控<sup>56</sup>。魏祠建於上林苑監三署，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明代權宦官勢力之巔峰，而立牌坊之舉被文秉評為：「無可獻媚，乃請建坊。愈奇而愈下矣！」<sup>57</sup>，《警世陰陽夢》第26回〈伏兵建祠〉有一對石坊，對聯題為「三朝捧日，一柱擎天」、「功高社稷，威震華夷」（頁128），與坊名皆盛讚其對於國家之功勳，因立生祠已難以凸顯褒揚魏忠賢的用

<sup>54</sup> 清·陶貞懷，李平編校，《天雨花》（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第26回，頁1054。以下引文隨文附上頁碼，不另作註。

<sup>55</sup> 明·文秉，《先撥志始》（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第5章卷下二，〈魏忠賢建祠〉，頁81。

<sup>56</sup> 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頁274。

<sup>57</sup> 明·文秉，《先撥志始》，第5章卷下二，〈魏忠賢建祠〉，頁80。

心，故獻媚者又增立牌坊，「功高冊府」便合理化了魏祠立於太學旁之原因。

## （二）從祀孔廟的意圖：化奸為賢

根據正史記載，魏忠賢並未入祠太學，而是另立一祠於太學（或國學）旁，《明史·徐光啟傳》載：「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於太學旁」<sup>58</sup>，描述魏忠賢開啟了宦官生祠意欲從祀孔廟之先例，孔廟作為官方祭祀制度，是傳統社會裡政治與文化的焦點，孔廟從祀制也是儒家道統的制度化<sup>59</sup>，明代從祀孔廟的人物必須經皇帝同意，對象除了孔門弟子之外，多以前朝人物為主。魏祠得以建於太學旁，始於監生陸萬齡上疏，《明熹宗實錄》天啟7年5月4日記錄其疏奏，即凸顯出立魏祠的正當性在於「復重光之聖學」：

篤生總督東廠司禮監秉筆魏太監，提不世之貞心、佐一朝之乾斷。……廠臣驅蔓連之邪黨、復重光之聖學，其功不在孟子距詖行、放淫詞之下。臣等佩服廠臣之教訓，念帝都為化起之地，而國學實首善之區。謹購國子監西偏民房空地一段，同心集鏹，以永祝釐，少展崇報之忱、用申仰止之意。恭建前楹，以敬奉廠臣崇德；……至于春秋二典，則與宣聖〔案：孔子〕、啟聖〔案：孔子之父叔梁紇〕之祠同舉並行。<sup>60</sup>

上述引文說明了陸萬齡替魏忠賢建生祠的理由、建議立祠的地點、祭祀的時間等，並與春、秋之祭孔大典合併舉辦，與孔子父子之地位並駕齊驅，對於東林黨人不啻為一大打擊。明代孔廟從祀制與儒家道統意識有

<sup>58</sup> 清·張廷玉等，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四史·明史》，卷二五一，列傳第139，〈徐光啟〉，頁4341。

<sup>59</sup> 黃進興，〈學術與信仰：論孔廟從祀制與儒家道統意識〉，《新史學》卷五第2期（1994），頁1、76。

<sup>60</sup> 明·溫體仁等撰，《大明熹宗愍皇帝實錄》，卷八四，〈天啟7年5月4日〉，頁4064。

強烈連結<sup>61</sup>，故魏忠賢雖未從祀於孔廟，但此意圖其實昭然若揭，小說中也時常描述主張立魏祠者與反對者，對於魏忠賢形象具有不同的奸／賢定位。

由於孔廟多建於國學旁，故小說中亦描述魏祠立於孔廟中或國學旁，作於崇禎元年6月的《警世陰陽夢》卷7第25回〈假功冒爵〉便有陸萬齡等人上疏，議立魏祠於北京國學中：

又有一班喪心病狂無恥的獸生陸萬齡等，上本稱魏忠賢功德，比禹、湯、周、孔，要朝廷封王、國學建祠。天啟七年八月二十一日，陸萬齡等在國子監動土起工，次日便是天啟爺晏駕升天了。  
(頁420-421)

稱魏忠賢功德「比禹、湯、周、孔」，是「朝廷封王」及替魏忠賢建生祠的重要理由，因禹、湯、周公為儒家推崇的先秦明君，歷代帝王祭孔時「必先躬親釋奠」。但小說敘述位於北京國子監旁之生祠動工翌日，天啟皇帝駕崩，羅元信指出此亦有邸報或奏疏事實之基礎<sup>62</sup>，如嘉興縣貢生錢嘉徵〈劾魏忠賢十大罪疏〉之第六項為：「至八月二十一日，陸萬齡等啟祠營工，而先帝遽以次日賓天」<sup>63</sup>，此疏將立魏祠連結了不祥的意涵：魏祠建於北京國子監之孔廟旁，因德不配位而得罪孔子，導致天啟皇帝駕崩，也暗示皇帝需要付出性命，為立魏祠於孔廟內負責。

成於崇禎元年或稍後的《聖烈傳》2卷〈魏忠賢矯旨建祠額〉，則節縮自《玉鏡新譚》所載通政使呂圖南糾劾陸萬齡等而上之奏疏<sup>64</sup>，明

<sup>61</sup> 黃進興，《聖賢與聖徒》（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頁98、105、133。

<sup>62</sup> 羅元信，〈〈林欽罷官〉——關於「林欽罷官」的史實、人物與文學作品〉，收入陳益源主編，《2019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78。

<sup>63</sup> 明·錢嘉徵，〈劾魏忠賢十大罪疏〉，《侍御公奏疏》，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第97冊，頁431-432。

<sup>64</sup> 明·朱長祚，《玉鏡新譚》（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七，〈建祠〉，頁101。

確指出陸萬齡「疏建祠於文廟中」<sup>65</sup>，而4卷〈天下賢臣遠引〉則詳細說明陸萬齡上疏「建立生祠於國子監學宮之傍」：

却說北京監生陸萬齡，首倡建立生祠於國子監學宮之傍，拆去天字一號屋宇，以克廣基址，有呈稱魏忠賢，內有云：「三案之典，即孔子之作《春秋》也；奸党之除，即孔子之誅少正卯也」等句。

（頁）

學宮或稱「廟學」，在明代中期以後，全國各地孔廟都位於國子監左側，左廟右學是明清地方廟學定型後的正規布局，根據西周以來「左祖」的原則<sup>66</sup>，可見小說也延續了史傳中魏祠建於孔廟與國子監旁的敘述。魏祠得以立於孔子旁，是因其「除奸党」之舉正如孔子誅亂政之少正卯，但此理由並不符合明代所認可的孔廟從祀標準，隆慶4年（1570）王世貞主持鄉試之題目「山西五策」中第三策，便論及孔廟從祀之標準：「文廟之有從祀者，謂能佐其師衍斯世之道統也，亦以報功也」<sup>67</sup>，文廟所祀者乃傳衍孔子聖道之真儒，其功在維繫橫越數代之「道統」。然而魏忠賢不但並未繼承此道統，反倒拆毀「天字一號屋宇」——即貢院第一列的儒考棚，對於儒生最重要的考試地點，竟被拆毀後設立魏祠，魏忠賢之輕視儒生可見一斑；魏忠賢欲從祀孔廟之意義，也由儒家「道統」之爭轉為「政統」之爭，能掌握孔廟之腹地者，方為帝王所認同的當權派。又，此回並敘南京國子監生樊元脩等人仿效北京監生建魏祠，明代孔廟為道統的象徵，且都城國學的孔廟結合王權中樞的皇帝和都城<sup>68</sup>，

<sup>65</sup> 明·西湖義士述，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皇明中興聖烈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日本長澤規矩野也藏本之明刊本影印），卷二，〈魏忠賢矯旨建祠額〉，頁120。

<sup>66</sup> 董勝，《官學盛況：國子監與學宮的教育》（臺北：崑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0），頁69。

<sup>67</sup>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臺北：偉文圖書公司，1976），卷一一五，〈文部策類 山西第三問〉，頁5378-5379。

<sup>68</sup> 廖宜方，《王權的祭典：傳統中國的帝王崇拜》（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頁384。

故兩京之一的南京建魏祠於國學旁，也反映出魏忠賢掌握知識份子話語權的意圖。

而《斥奸書》（崇禎元年刻本）第24回〈頌功德遍災土木〉敘述浙江織造太監李實在杭州西湖為魏忠賢建生祠，隨後在第25回〈陸監生媚配學宮〉情節中，陸萬齡見狀亦與祝監生（案：應為儲寓奇）商議效法上奏：

祝監生道：「要奉承他，無過建祠。……。須得上本，說他應與孔子同俎豆千秋，這纔奇，纔哄得他歡喜，纔像是我們監生公舉。」

陸監生道：「孔子仔〔怎〕麼比得？」祝監生把他背一敲道：「……他方理東廠，而除東林，何殊七月〔日〕之誅少正〔卯〕？……且力除狡獪，朝飲絕奸，屢變民風，別塗成化。素王德固垂于萬世，廠臣功亦偉于千秋。況《春秋》明一代之是非，《會〔要〕典》定三朝之功罪。你道好麼？」<sup>69</sup>

在陸萬齡上疏之前，魏祠未立於孔廟之腹地範圍，陸萬齡與祝監生之對話內容，較《聖烈傳》更詳細地說明何以魏忠賢得以比肩孔子之功德，改善時代風氣；魏忠賢開館纂修之《要典》可與孔子作《春秋》定功罪相比擬，故可立祠於孔廟旁，與孔子千秋萬世地共享祭孔大典。此應出於《明史·閹黨·閹鳴泰》「生祠之建」條之陸萬齡疏文：

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宜建祠國學西，與先聖並尊。<sup>70</sup>

《斥奸書》之《會典》應為天啟6年（1626）6月成書之《三朝要典》（初名《從信鴻編》，又稱《三大政紀》，共24卷），由內閣大學士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等編撰，內容是萬曆、泰昌、天啟三朝「梃擊」、「紅丸」、

<sup>69</sup> 明·陸雲龍，《魏忠賢小說斥奸書》，第24回，收入侯忠義主編，《明代小說輯刊》（成都：巴蜀書社，1993），頁901-902。以下引文隨文附上頁碼，不另作註。

<sup>70</sup> 清·張廷玉等，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史·明史》，卷三零六，列傳194，〈閹黨·閹鳴泰〉，頁5269。

「移宮」三大案的示諭奏疏檔冊，並加上案語，目的是貶低東林黨人<sup>71</sup>，並強化魏忠賢及其支持者的政治話語權。而《聖烈傳》、《斥奸書》以《三朝要典》比擬《春秋》「明是非」、「除奸黨」之功，正反映出魏忠賢掌握了政統和道統。

弘光元年成書的《勦闖通俗小說》第1回「李公子民變聚眾」情節，解釋北京文廟旁之魏祠得以立於孔廟旁，是因「功過周公，德擬孔聖」，更將魏忠賢比擬於孔子以外的先賢聖王：

更有無恥小人，稱其功過周公，德擬孔聖，請于北京文廟之傍，建立魏公生祠。南都亦效其尤風，十三布政，爭先立祠獻詔。<sup>72</sup>陸萬齡上疏建魏祠之理由，便稱魏忠賢有發揚聖學之功，故可立祠於孔廟旁，而與周公並列，此亦可與明末清初之《明季北略》卷3相對照：「惡生李暎日比忠賢為周公疏」<sup>73</sup>，《樵史》15回「應風雲眾正齊糾」情節亦有：「李暎日比忠賢為周公，頌他功德如周公之輔成王」<sup>74</sup>，可見將魏忠賢比擬周公之功德其來有自。至於在清代《天雨花》第26回「左丞相怒毀隆仁祠」情節中，武昌隆仁祠對聯為：「德被萬方齊孔孟」、「功高千古並伊周」（頁1054），尚將魏忠賢比擬於孟子、伊尹等孔廟配祀的前朝聖賢<sup>75</sup>，將魏忠賢之功比擬孟子已見於前述陸萬齡上疏，而小說作者為了凸顯魏忠賢雖有從祀孔廟之意圖，卻與其他孔廟從祀者之

<sup>71</sup> 楊豔秋，〈《明光宗實錄》、《三朝要典》的編修〉，《史學史研究》第4期（1998），頁51。

<sup>72</sup> 明·西吳懶道人口授，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勦闖小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日本內閣文庫之興文館刊本影印），第1回，頁4-5。

<sup>73</sup> 明·計六奇，任道斌、魏得良點校，《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三，天啟7年丁卯8月至12月，〈陸萬齡下獄〉，頁79-80。

<sup>74</sup> 清·江左樵子，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樵史通俗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初寫刻本影印），第15回，頁270-171。以下引文隨文附上頁碼，不另作註。

<sup>75</sup> 孟子於南宋度宗咸淳3年（1267）正月成為「四配」之一，配享孔子；而伊尹、周公為唐高宗時訂定之先代帝王祭祀的配享功臣。廖宜方，《王權的祭典：傳統中國的帝王崇拜》，頁317。

間有巨大差異，故以史實為據，從明末至清代不斷擴大與魏忠賢奸／賢形象對比之隊伍。

又，明末成書之《禱杌閑評》第50回「明懷宗旌忠誅眾惡」、清代江左樵子《樵史》第19回「鋤遺孽各逆典刑」情節皆有：「生祠遍海內，半割素王之宮」（頁350）之敘述，呈現出明末清初小說作者對於魏祠數量之多，及立祠於孔廟內，佔據孔廟大半土地之負面回憶；而《斥奸書》第25回〈陸監生媚配學宮〉之回目與情節內容，亦明確指出魏祠「配學宮」，並虛構出魏忠賢的第一人稱反應：

〔案：魏撫民〕道：「外邊有幾個監生，他說叔爺功德浩大，與孔子一般，當建祠太學，與孔子同血食不朽。」忠賢道：「哈哈！咱難道便是個孔聖人？」撫民道：「據那監生講，比孔聖人還高哩！」忠賢道：「咱却沒處去教學，沒這三千徒弟子、七十二賢人。」撫民道：「論起如今，內外官員都在叔爺門下，叔爺的門生還多哩！便孔夫子，還沒有這等個個帶紗帽的哩！」（頁903）

魏忠賢對於能配祀於孔廟也大感意外和疑惑，因其自知不如孔子培養出眾多賢德弟子，但魏撫民卻誇言依附魏忠賢之官員人數更多，勝於孔子之弟子並無當官者，不只抬舉魏忠賢之地位高於孔子，超出《勦闖通俗小說》中「德擬孔聖」、《警世陰陽夢》中「比禹、湯、周、孔」之等級；除了比擬於孔子著《春秋》的立言之功，更合理化其得以立祠於孔廟旁之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三千弟子並非如魏撫民所言皆未當官，如孔門四科十哲中，唯有閔子騫和顏淵無從政經驗<sup>76</sup>，故小說作者可能有藉此諷刺魏撫民學識與德行皆淺薄之用意，或是凸顯出魏撫民為了奉承魏忠賢，而說出罔顧儒者常識之言詞。

第26回〈耿兵備不拜觸奸〉之情節，則綜述明末各地官員為建魏祠於國子監前之風潮：

<sup>76</sup> 李啟謙，《孔門弟子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87），頁25。

陸萬齡相繼在國子監前立廟，然後南直則有監生樊元修一起具本建祠，北京則有孫如洌一起傳帖題請，浸至各省，沿及九邊〔案：又稱九鎮，是弘治年在北部沿長城防線陸續設立的九個軍事重鎮〕。也有佔賣官民田地興工的、也有拆毀先賢祠宇改造的。僭用琉璃瓦、白玉階，丹宸朱戶，繞鳳飛龍，只是尋常之事。（頁908-909）

陸萬齡開啟了監生替魏忠賢立生祠於孔廟之風氣，被視為士風墮落的重要指標，南京監生樊元修、北京太僕寺少卿孫如洌等文官，亦題請建魏祠，但生祠之形制不合禮制，與25回祝監生的奉承之語「別塗成化」相對照，更顯出魏祠敗壞時代風氣。因「琉璃瓦、白玉階，丹宸朱戶，繞鳳飛龍」為帝王使用的建築裝飾<sup>77</sup>，孔廟於萬曆28年（1600）全改用琉璃瓦<sup>78</sup>，因此立於孔廟旁的魏祠因有從祀孔廟之意圖，故堂而皇之地使用琉璃瓦，可見魏祠自建祠之理由至祠廟外觀，皆不符從祀孔廟者之定制，但這卻被視為「尋常之事」；而「拆毀先賢祠宇改造」也反映出依附魏黨者並不在意僭用之舉，故毀壞先賢祠宇並改為魏祠，反映出小說作者批判立魏祠毀壞道統的意圖。

清代順治年間成書之《天雨花》第26回「左丞相怒毀隆仁祠」描述湖廣巡撫姚宗文建武昌隆仁祠於學宮之右，建築與擺設皆高貴精巧：

各督撫諂媚忠賢，盡建祠於學宮左右，……鏤鳳雕龍造得精！……只見雕梁畫棟窮工巧，白石欄杆曲折新，紫檀香案當中擺，地下磨磚鏡面平。碧玉爐中煙裊裊，黃金蠟照焰瑩瑩，神廚上掛黃綾幔，……殿頭左右排儀仗，周圍梁上掛晶燈，輝煌金碧光燦爛，不亞朝中寶殿門。（頁1056）

<sup>77</sup>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一，〈宮闕制度〉：「凡諸宮門，皆金鋪、朱戶、丹楹、藻繪、彤壁、琉璃瓦飾檐脊。」收入徐永明、楊光輝整理，《陶宗儀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頁338。

<sup>78</sup> 劉祚臣，《北京的壇廟文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頁101。

武昌隆仁祠建築華麗的程度「不亞朝中寶殿門」，已暗示其用度與擺設僭用帝王禮制，金碧輝煌的魏祠中有水晶燈、碧玉爐、紫檀香案桌、黃金白玉瓶、龍鳳黃綾幔，「黃綾幔」為太廟中的帝后寢宮專用<sup>79</sup>，但魏祠竟僭越禮制而使用，可見明末清初小說作者藉由魏祠之建築與擺設僭用帝王禮制，表達出對於魏忠賢從祀孔廟的不滿。直至道光年間梁紹壬筆記《兩般秋雨齋隨筆》卷7〈挂冠〉：「天啟中，林祭酒以陸萬齡〔齡〕請魏忠賢從祀孔廟，挂冠而去」<sup>80</sup>，反映出魏忠賢請旨「從祀孔廟」的意圖，在於掌控文官重視的孔廟，因而引發林釭憤而辭職；道光27年成書的甘熙《白下瑣言》卷8〈覆舟山下崇聖祠〉亦有：

當魏閣構亂之秋，生祠遍天下，甚至配饗文廟，名教淪喪殆盡，莊烈御〔案：崇禎帝之諡號為莊烈皇帝〕極痛加芟夷，乃餘風未殄，……。（頁5a）

作者批評魏祠配饗孔廟為「名教淪喪殆盡」，即使崇禎帝令毀魏祠，一時之間仍難以完全消滅魏忠賢餘黨之勢力。上述二則清代筆記皆延續此前的小說《聖烈傳》、《斥奸書》中，陸萬齡奏請魏忠賢生祠「從祀孔廟」之說及文人一貫的批判立場，可見明清小說中宦官「意圖從祀孔廟」之敘事影響頗大。

### 三、生祠塑像、喜容與建築：賢／奸宦形象之神化

宦官生祠敘事除了生祠賜額與從祀孔廟之意圖，也有生祠塑像與喜容的敘事，共同形塑出宦官形象，高志忠將明代宦官形象分為高才雅士、優伶男寵、佞幸權宦<sup>81</sup>，便反映出宦官歷來多為奸惡形象。而明清

<sup>79</sup> 傅公鉞，〈清代的太廟〉，《故宮博物院院刊》第3期（1986.6），頁78。

<sup>80</sup>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挂冠〉，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263冊，頁181。

<sup>81</sup> 高志忠，《明代宦官文學與宮廷文藝》（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頁

筆記與小說中的宦官生祠塑像，從剛開始的無外貌敘述，到後來細緻描繪塑像的材質、服飾、配件，當宦官失勢後，其塑像之去留也反映出時人認為其對於地方是否確有貢獻，而僭越禮制的生祠建築描述也反映出時人對於宦官的奸／賢印象。以下分為「生祠塑像與喜容：神化賢宦與權宦之形象」、「生祠建築：僭越禮制的奸／惡宦形象」，討論生祠塑像、喜容與建築對於形塑賢／奸宦形象系譜之意義。

### （一）生祠塑像與喜容：神化賢宦與權宦之形象

明清的「賢宦」論述多由德政詩文所建構，反映出地方仕宦與文人藉由疊合在地方任職的宦官與「賢宦」形象，所欲達到「化宦」之目的，吳兆豐便從劉璟之生祠德政詩文集分析宦官介於賢惡之間的兩面形象<sup>82</sup>，明清小說中魏忠賢以前兼具賢宦、權宦形象者，可以明成祖時的鄭和（1371-1433）為代表，陳學霖已注意到萬曆年間成書之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佚名〈奉天命三保下西洋〉雜劇，著重演繹鄭和、王景弘等宦官之正面形象<sup>83</sup>，但其討論重點在於「宦官統帥下西洋」一事，雖有助於理解「賢宦」形象的形成，並對照「奸／惡宦」之形象，但較未論及宦官在兩種形象之間的游移與曖昧性，故明清筆記與小說中如何形構擺盪於二者之間的明代宦官形象，便有值得探討之處。而宦官形象之建立，可以「生祠塑像」為切入點，因塑像多提及宦官之外貌、服飾與配件等，有助於理解時人如何形塑宦官之形象。

宦官生祠立塑像或許始自雨花臺普德寺的劉瑾生祠（西湖魏祠賜額亦使用「普德」命名），而孫隆亦延續西湖之孫公祠奉塑像的傳統，設立宦官之生祠塑像或許代表部分士民認同其對於地方的貢獻，不只是宦官本人為了追求賢宦之名聲，同時也希望其形象得以流傳，但二者之生

---

371-372。

<sup>82</sup> 吳兆豐，《有教無類：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動研究》，頁 257-259。

<sup>83</sup> 陳學霖，〈明代宦官與鄭和下西洋的關係〉，收入《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48 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頁 188-190。

祠敘事並未詳述其塑像之形象。而魏祠塑像則有較多相關記載，如明代宦官劉若愚崇禎2年至14年（1629-1641）寫成《酌中志·客魏始末紀略》，提及魏祠塑像隨著其失勢而全毀：「各處生祠逆像，並廢毀無遺」<sup>84</sup>。除了筆記以外，小說亦提及魏忠賢生祠中的塑像，如明末《鼓掌絕塵》第36回「貶鳳陽奸宦權傾」情節，藉由魏忠賢與崔呈秀之問答，道出魏祠內供奉有魏忠賢生像：

魏太監道：「這個咱爺到沒有知道，甚麼叫做生祠？」崔呈秀道：「把殿爺塑了一個生像，那些百姓朝夕焚香頂禮，願殿爺與天同壽。」<sup>85</sup>

生祠塑像是為了供百姓早晚焚香膜拜，祈禱魏忠賢與天齊壽，故生祠塑像具有加強魏忠賢崇拜之作用，但嘉靖9年（1530）已廢除孔廟之孔子塑像、只設木主，亦將兩廡從祀者改為木主<sup>86</sup>，魏祠既有從祀於孔廟之意圖，本不應有塑像，而魏祠竟採用不合孔廟之儀制，魏忠賢所欲塑造的「賢宦」形象，反倒被小說作者藉由立生祠塑像之情節，坐實「奸宦」之僭越禮制。

在明代《櫛杌閑評》第42回「建生祠眾機戶作俑配宮牆」情節中，提及杭州魏祠建造之因，是機戶為免除稅收，而暫時答應掌家的立祠提議，此情節詳述了魏忠賢矯旨立祠、賜額與立像之過程：

忠賢便矯旨道：「生祠賜額，以彰功德，著有司歲時致祭。」李實得了旨，忙摹勒匾額，又雕成一座沉香小像，上戴九曲簪纓，大紅蟒衣，玉帶象笏。會同三院〔案：東廠、西廠和內行廠〕率領各官穿了吉服，並眾機戶，俱持香送入祠內，置酒演戲，奏樂慶賀。有那些趨炎附勢的做幾首歪詩，刊德政碑，刻功德祠錄。又於《西湖志》上增入〈祠堂記〉、〈魏司禮小像傳〉。（頁1414）

<sup>84</sup> 明·劉若愚輯，《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卷一四，〈客魏始末紀略〉，頁203上。

<sup>85</sup> 明·古吳金木散人編，《鼓掌絕塵》（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第36回，頁432。以下引文隨文附上頁碼，不另作註。

<sup>86</sup> 曲英杰，《孔廟史話》（臺北：國家出版社，2004），頁114。

「生祠賜額，以彰功德」明確指出帝王賜祠額的意義在於彰顯宦官之功德，以強調其具備政統之合法性，上一節已有所討論。在此情節中，魏忠賢的沉香像裝扮被描述為：「九曲簪纓，大紅蟒衣，玉帶象笏」，「簪纓」指高官顯宦的冠飾；「紅蟒衣」是明朝創造的繡蟒官服，蟒形似龍而少爪，以金線繡於衣上，明初只限於皇帝左右宦官及得寵親信人臣所服，也是錦衣衛的標誌性特徵<sup>87</sup>。《明史·輿服三》引用《大政記》說明永樂以後皇帝左右的宦官著蟒服：

永樂以後，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制如曳撒〔案：下擺有密集豎褶的交領長袍〕，繡蟒於左右，……。貴而用事者，賜蟒，文武一品官所不易得也。<sup>88</sup>

蟒服象徵僅位於帝王之下的尊貴身分，即使是文武一品官也不易取得，故魏忠賢之生祠塑像著蟒衣，顯示其身分高貴。從三院與地方士民熱鬧迎塑像入魏祠的描述，可見「功德祠」啟用過程之盛大，雖然魏忠賢立生祠是因對於地方實有貢獻；但在熱鬧場景的敘述中，也暗含小說作者對於過度誇大其貢獻之負面評價。至於《天雨花》第26回「左丞相怒毀隆仁祠」描寫武昌隆仁祠中的魏忠賢「聖像」：「王者衣冠檀琢體，鬚眉畢肖宛如生」（頁1056），「王者衣冠」直指其塑像僭用帝王服飾，而檀木像之貴重材質也可與前述之沉香像相比擬，從塑像服飾與材質，皆可見小說作者用心描繪生祠塑像之權宦形象。

而《斥奸書》第24回「頌功德遍災土木」情節亦與此相似，但更著重描述塑像的服飾細節：

不想忠賢擬旨，只准了一半：「生祠賜額功德，有司歲時致祭。……。命下，李織造已於自衙門內雕出一個神像，上帶朝冠，身披朝服，大陳儀衛，著杭州、湖州、嘉興、松江、蘇州局官、

<sup>87</sup> 熊劍平，《錦衣衛：紅蟒、飛魚、繡春刀，帝王心機與走向失控的權力爪牙》（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9），頁23。

<sup>88</sup> 清·張廷玉等，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四史·明史》，志第43，〈輿服三·內使冠服〉，頁1100。

所官都穿了紅，擺馬導，機匠持香，送入祠去。……不數日，說朝廷賜他九曲簪纓，又做了簪纓，碧玉帶一條，白玉帶一條，象笏，俱捧在木俑手中。（頁899）

塑像之材質為木製，呼應了《櫛杙閑評》中名貴的「沉香小像」，而「上帶朝冠，身披朝服」是官員標準的上朝裝扮，後因朝廷賜其九曲簪纓，故增飾「簪纓，碧玉帶一條、白玉帶一條、象笏」，以凸顯其官位顯赫，明代四品官以上方能使用「象笏」<sup>89</sup>，而魏忠賢之官職為錦衣衛指揮使（三品）、司禮監太監（四品），故此為符合其品級之器用；而「碧玉帶」與「白玉帶」是不同於《櫛杙閑評》的細節敘述，明代官服以玉帶（指用玉裝飾的皮革製腰帶，即革帶）最尊貴，一品官才能配戴<sup>90</sup>，「蟒袍玉帶」為明代高官的標誌<sup>91</sup>。另外，其塑像入祠時「大陳儀衛」之大陣仗，也顯示出其僭越禮制，即使熹宗於天啟6年（1626年）冬封魏忠賢為上公並加恩三等，為皇族以外的最高爵位，但魏忠賢並未封王，故無權運用掌王府護衛之儀衛司<sup>92</sup>，故《警世陰陽夢》第23回〈築城看邊〉

<sup>89</sup> 明·張自烈編，清·廖文英補，《正字通》（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下冊，〈未集上·竹部〉：「明制，笏，四品以上用象牙。」，頁867下。

<sup>90</sup> 清·張廷玉等，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四史·明史》，卷六七，志第43，〈輿服三·文武官公服〉：「洪武二十六年定，……腰帶：一品玉，或花或素」，頁1093。

<sup>91</sup> 華慈祥，〈明代玉帶形制及相關問題芻議〉，收入上海博物館編，《中國隋唐至清代玉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326。

<sup>92</sup> 清·張廷玉等，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四史·明史》，卷七六，志第52，〈職官五·王府護衛·附儀衛司〉：「王府儀衛司。儀衛正一人，正五品。儀衛副二人，從五品。典仗六人，正六品。儀衛，掌侍衛儀仗。護衛，掌防禦非常，護衛王邸。有徵調，則聽命於朝。明初，諸王府置護軍府。洪武三年置儀衛司，司設正、副各一人，秩比正、副千戶；司仗六人，秩比百戶。四年改司仗為典仗。五年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每王府設三護衛，衛設左、右、前、後、中五所，所千戶二人，百戶十人。又設圍子手二所，每所千戶一人。九年罷護軍府。建文中，改儀衛司為儀仗司，增置吏目一人。成祖初復舊制。」頁1243-1244。

亦有：「托著天子威福，侍從儀衛，都是僭妄上用的」（頁368），皆反映出立祠儀式之違反禮制。

明末清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先曾祖日記》，提及天啟6年南京二十四衙門所建魏祠（天啟4年至6年建造，未完工）中，分別有畫像和塑像：

在後宰門，興善寺傍。其祠大三間，有魏璫真容三副，正間一副，畫朝衣端坐，兩傍小內豎執圓扇牙笏。又木刻魏璫一像，坐正間。其左間一副，畫金盃金甲端坐，兩傍皆武將，執鎗劍侍立。其右間畫方中〔案：應為巾〕行衣，端坐，兩傍皆小內官恭候。<sup>93</sup>

魏忠賢之木像分別為上朝之「朝衣」，強調其出將入相之顯貴地位；而畫像則是「方中行衣」及武官「金盃金甲」之形象，「行衣」明代中後期士人流行的常服或正裝，上下通裁、兩側開衩，領、袖和下襠都有緣邊，穿著時腰部繫大帶，常搭配方巾、東坡巾等冠服<sup>94</sup>，因與道服之形制和用途類似，故常被歸為一類服飾，由於明熹宗崇奉道教<sup>95</sup>，故魏忠賢喜容（即生前之畫像）特別採用道士形象，試圖以明代天啟年間盛行的道教合法化魏祠的宗教地位。

除了杭州功德祠、武昌隆仁祠以外，明末《鎮海春秋》第17回敘述魏忠賢曾自塑三座生祠塑像，由差官送至邊關錦州、寧遠，及毛文龍鎮守之平島（應為皮島，現稱椴島，位於鴨綠江口東之西朝鮮灣）：

<sup>93</sup> 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卷上六，〈焚塵寄 勝國遺聞〉，頁247。

<sup>94</sup> 明·王夫之《識小錄》：「衣布行衣，青衣藍緣；繫大帶，亦青質藍緣；白襪，青鞵。……京官可便服以見外吏。」，收於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船山全書》（長沙：岳麓書社，1996），第12冊，頁606。

<sup>95</sup> 明·溫體仁等，林燊祿點校，《明熹宗實錄點校》（新北：稻鄉出版社，2021），第10輯，卷六零，天啟5年6月丙戌：「命張顯祖承襲祖職，為正一嗣教真人。」，頁254。

聖上加封寧國公〔案：魏良卿〕，又欽准該衙門奏章，各處啟建魏爺生祠，供奉魏爺形象。俺魏爺唯恐老爺這裡兵事匆匆，故此魏爺自己裝塑了，送到老爺這裡來。<sup>96</sup>

此情節虛構送生祠塑像至邊關，也反映出魏忠賢不滿足邊鎮尚無魏祠，故藉由「自己裝塑」表達自我形塑形象、提高其於邊關影響力之意圖；而毛文龍將塑像置於土地公廟門外之空地看門，則極力彰顯對於魏忠賢的蔑視，及作者為毛文龍辯護的用心<sup>97</sup>。袁崇煥於崇禎2年6月18日上《薊遼督師袁崇煥題本》，有平島之魏忠賢塑像相關敘述：「塑冕旒像於島中，十當斬」<sup>98</sup>，因明代皇帝袞冕的要件之一為「冕旒」（即冕冠）<sup>99</sup>，魏忠賢之「冕旒像」與生祠建築皆僭用帝王身分之裝飾，故以此作為毛文龍當斬之罪，雖與小說中毛文龍處理生祠塑像之態度截然不同，但史籍、筆記與小說一致呈現出魏祠塑像「神化」宦官地位之目的。而明代《先撥志始》亦載薊州魏祠的魏忠賢畫像「垂旒執笏」<sup>100</sup>，可見此乃魏祠塑像和畫像流行的造型之一。另，劉若愚《酌中志》雖記載魏忠賢生祠塑像已全毀，但徐濤研究指出，天啟7年（1627）5月至11月改建之延綏榆林「祝恩祠」存有魏忠賢銅像，當地官員已摧毀像上之冕旒與背後銘文<sup>101</sup>，可見「冕旒像」確為邊關魏祠塑像之造型；而明末朱長祚《玉鏡新譚·建祠》（崇禎元年3月3日出版，1628）引用科道郭興言疏略云：

<sup>96</sup> 明·吳門嘯客，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鎮海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本影印），第17回，頁211。以下引文隨文附上頁碼，不另作註。

<sup>97</sup> 李劍國、陳洪，《中國小說通史：明代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頁1160。井玉貴，《陸人龍、陸雲龍小說創作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頁159。

<sup>98</sup> 清·張廷玉等，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四史·明史》，卷二五九，列傳第147，〈袁崇煥 毛文龍〉，頁4490。

<sup>99</sup> 清·張廷玉等，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四史·明史》，卷六六，志第42，〈輿服志二·皇帝冕服〉，頁1079-1081。

<sup>100</sup> 明·文秉，《先撥志始》（成都：巴蜀書社，1993，據借月山房彙鈔第五集影印）第5章卷下二〈魏忠賢建祠〉，頁682上。

<sup>101</sup> 徐濤、劉合心，〈榆林新明樓魏忠賢銅像考〉，《文博》第3期（2002.3），頁78-79。

「忠賢即勢焰滔天，於邊臣無相臨之分。既生祠一塑像，又何當縉紳禮拜？」<sup>102</sup>邊關立有代表魏忠賢勢力形象化延伸之生祠及塑像，反映出時人批評魏忠賢之勢力甚至影響至駐守邊疆的大臣與官員。

魏忠賢以前的宦官如劉瑾、孫隆，在筆記與小說中多指出其生祠塑像為當地人供奉，甚至在宦官失勢後仍能保留於原建築中，是源於對於地方之貢獻，突出其「賢宦」之形象，故以德政詩、德政碑，刻功德祠錄等塑造其「賢宦」形象；而筆記與小說中魏忠賢生祠塑像之紀載，亦強調對於地方之貢獻，並形塑出其塑像所著朝服、配飾之「權宦」形象，且越晚之記載增飾更多細節，可見小說作者有意識地形塑其「賢宦」兼「權宦」形象，至此建構完成了自劉瑾、孫隆以來的生祠塑像系譜。

## （二）生祠建築：僭越禮制的奸／惡宦形象

明代宦官的「奸／惡宦」形象較「賢宦」形象更突出，可歸咎於魏忠賢專權被認為是導致明亡的重要因素，歷來研究已分析明清小說如何塑造魏忠賢之奸／惡宦形象，如郭書瑄分析明末清初魏忠賢小說中的「紀惡」書寫，譴責魏忠賢之惡行<sup>103</sup>；梅碧波分析《警世陰陽夢》、《斥奸書》、《聖烈傳》、《檣杵閑評》、《鼓掌絕塵》中的魏忠賢形象，既為典型的反面人物，又有奸邪形象的善面<sup>104</sup>。羅剎狂人《斥奸書·敘》評魏忠賢「奸惡之橫行」（頁757），《檣杵閑評》第32回開場詞「嘆奸惡」與第49回詩「奸惡之生不偶然」（頁1099、1625）、《鎮海春秋》第17回「奸佞饕餮多敗國」（頁210）、《鼓掌絕塵》第36回〈滿庭芳〉詞云：「當權奸宦」（頁434）、《樵史》第1、3回的「奸璫」、「權奸」等，同樣描寫奸惡的權宦形象。但正如上一節所提及，若以「立生

<sup>102</sup> 明·朱長祚，《玉鏡新譚》，卷七，〈建祠〉，頁101。

<sup>103</sup> 郭書瑄，《明末清初「魏忠賢」小說研究》，頁151。

<sup>104</sup> 梅碧波，《論明末清初白話小說中的魏忠賢形象》（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8），頁24-28。

祠」一事為切入點，魏祠之設立或許與其對於地方之貢獻有所關聯，因此筆記與小說中的魏忠賢並非全然是奸／惡宦形象。

明末清初朱彝尊〈〈先君子五言詩〉書後〉便提及魏祠華麗，及建築僭用琉璃瓦：

祠以宏麗相尚，瓦用琉璃，像加冕服。有沉檀塑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腸腑則以金玉珠寶充之，髻空一穴，簪以四時花朵。<sup>105</sup>

前文已論及生祠使用琉璃瓦、塑像著冕服皆是僭用帝王禮制，而塑像材質為沉檀，即是沉香木和檀木，皆為貴重之木材；塑像內部甚至以金玉珠寶填充，極其奢華，此處亦提及魏祠建築競相追逐外觀富麗堂皇，暗示了生祠建築裝飾之不合禮制。明代「奸／惡宦」形象之形成與生祠建築逾越禮制頗有關聯，如《明史·閹黨·閹鳴泰》「生祠之建」：

開封之建祠也，至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者。……而都城數十里間，祠宇相望。<sup>106</sup>

引文描述開封之魏祠「創宮殿九楹，儀如帝者」，且因建魏祠蔚為成風，導致魏祠與民居爭地，「數十里間，祠宇相望」說明了都城魏祠數量之高密度；而「九楹」為宏偉的帝王廟儀制<sup>107</sup>，體現帝王「九五之尊」，凸顯出魏祠不只逾越禮制，也造成百姓之不便。

而明末小說《警世陰陽夢》第26回〈建祠伏兵〉情節，則指出西湖魏祠位於風景優美處，且裝飾華麗：「飛甍連雲，巍然獨峙於勝境；金碧耀日，儼如無上之王宮。門賜金額」，「儼如無上之王宮」即指出魏祠建築僭用帝王儀制，故作者於回末批評道：「可笑那魏賊，活活裡一

<sup>105</sup>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十三》，卷五三，跋十二，〈〈先君子五言詩〉書後〉，《四部叢刊·初編》（臺北：商務印書館，1937，景上海涵芬樓藏原刊本），第1700冊，頁11a。

<sup>106</sup> 清·張廷玉等，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四史·明史》，卷三零六，列傳194，〈閹黨·閹鳴泰〉，頁5268。

<sup>107</sup> 日·伊東忠太，蔡婷朱譯，《中國建築史考察筆記》（《見聞野帖『清國』》）（新北：楓樹林出版社，2023），頁25。

個人，普天下造了祠，塑了像，要人拜他」（頁128）。此處關於魏祠外觀之敘述應源於明代朱長祚《玉鏡新譚》卷7〈建祠〉，唯有「各題其額」<sup>108</sup>改為「門賜金額」，小說中的御賜「金額」在其他紀載中較少見，或許是為了呼應金碧輝煌的生祠建築，因此增加了金額的敘述。由上述可見，生祠建築與塑像、畫像共構出權宦之賢宦、奸／惡宦形象，生祠因僭用禮制而被明清筆記和小說作者所批判，但權宦卻藉由神化其形象，展現出其對於國家和地方之貢獻，兩方各從不同的角度，共同形塑出游移於賢／奸之間的權宦形象。

#### 四、結論

歷來研究明清小說中的宦官敘述多聚焦於明末魏忠賢，及其禍國殃民的權宦事蹟與形象，而立宦官生祠的情節被視為形塑其負面形象的方式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替宦官立生祠始自明代，隨著劉瑾、王堂、孫隆、劉璟等權宦之勢力越加龐大，宦官生祠之數量也增多，藉朝廷之外的權威傳達有利的政治信息，故宦官生祠敘事有其重要性，本文主要聚焦於明清小說如《警世陰陽夢》、《魏忠賢小說斥奸書》、《聖烈傳》、《禱杌閑評》、《鼓掌絕塵》、《剿闖通俗小說》、《樵史》、《天雨花》等，並參照筆記，探究宦官生祠敘事之呈現、演變及其意義。

首先，「生祠賜額與從祀孔廟的意圖」呈現出「政統與道統話語權之爭」，經帝王批准所立之生祠具有政統上的合法性，《斥奸書》與《天雨花》沿用正史的觀點，指出生祠建築與擺設僭用帝王規格，是導致帝王駕崩和明亡的重要原因。魏祠以前已有其他宦官生祠之「帝王賜額」，但名稱卻較少被記載，而《斥奸書》、《禱杌閑評》、《天雨花》中的魏祠祠額多以仁、德等儒家德目命名，盛讚宦官對於國家和地方之貢獻，以彰顯「賢德」之賢宦形象和對於百姓的「恩惠」。至於魏祠「從

<sup>108</sup> 明·朱長祚，《玉鏡新譚》，卷七，〈建祠〉，頁101。

祀孔廟的意圖」開啟宦官立生祠於孔廟和太學旁的風氣，反映出宦官已取得道統之話語權，達到宦官勢力的巔峰，故致力於使其形象「化奸為賢」，《警世陰陽夢》、《斥奸書》、《剿闖通俗小說》、《天雨花》中之宦官生祠，也多選址於都城、西湖等名勝，以達到宣揚「權宦」權力之效果。

其次，「生祠塑像、喜容與建築」神化了明代權宦之「賢／奸宦」形象，從明清筆記和《斥奸書》、《櫛杌閑評》、《鼓掌絕塵》、《鎮海春秋》描寫生祠塑像與生前畫像的服飾與配件僭用帝王儀制，反映出作者批判「權宦」的意圖。然而小說與筆記中的宦官形象有異於正史中的「奸宦」形象，並藉由塑像造型確立其宗教合法性；雖然宦官生祠存在的時間不長，多隨著其失勢而被拆毀，但卻可能因對於當地有所貢獻之「賢宦」形象，使其塑像得以保留於生祠改建成的建築中。明清小說中魏忠賢以前的宦官生祠敘事便有其脈絡和演變過程，權宦因耗費鉅資立生祠、建築僭越禮制而飽受批評，故小說中的「權宦」多為「奸／惡宦」形象，而魏祠敘事延續並強化了明代宦官的負面形象；至於清代則在明代小說生祠敘事的基礎上增加細節，反映出中央官員與地方仕宦對於權宦的不同態度，形塑出游移於賢宦、奸／惡宦之形象，故梳理明清筆記與小說中魏忠賢以前的宦官生祠敘事，有助於理解宦官形象之來源和演變，並可藉由生祠「神化」宦官形象的過程與意義，理解明清宦官敘事的多元性。

## 參考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唐】孫過庭，朱建新箋證，《書譜箋證》。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 【元】陶宗儀，徐永明、楊光輝整理，《陶宗儀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 【明】《萃美錄》。明正德年間刻本。
- 【明】文秉，《先撥志始》。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據蘇州市圖書館藏清初鈔本影印。
- 【明】文秉，《先撥志始》。成都：巴蜀書社，1993，據借月山房彙鈔第五集影印。
- 【明】王夫之，《識小錄》。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船山全書》，第12冊。長沙：岳麓書社，1996。
- 【明】王廷相，《王廷相集·王氏家藏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
- 【明】古吳金木散人編，《鼓掌絕塵》。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 【明】朱長祚，《玉鏡新譚》。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明】西吳懶道人口授，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勦闖小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日本內閣文庫之興文館刊本影印。
- 【明】西湖義士述，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皇明中興聖烈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日本長澤規矩野也藏本之明刊本影印。
- 【明】佚名，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檣杌閑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清木刻本。
- 【明】吳門嘯客，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鎮海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本影印。

- 【明】劉若愚輯，《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 【明】李贄，劉幼生編，《李贄文集·續藏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 【明】季嬰，《西湖手鏡·湖堤孤山敘勝》。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9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明】長安道人國清編次，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警世陰陽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大連圖書館藏崇禎元年〔1628〕刊本影印。
- 【明】計六奇，任道斌、魏得良點校，《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明】唐樞，《國琛集》。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 【明】張自烈編，【清】廖文英補，《正字通》。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
- 【明】張岱，馬興榮點校，《西湖夢尋》。北京：中華書局，2007。
- 【明】陳洪謨，《繼世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明】陸雲龍，《魏忠賢小說斥奸書》。收入侯忠義主編，《明代小說輯刊》。成都：巴蜀書社，1993。
- 【明】費宏等，《明武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明】溫體仁等，《大明熹宗愍皇帝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 【明】溫體仁等，林燊祿點校，《明熹宗實錄點校》，第10輯。新北：稻鄉出版社，2021。
- 【明】談遷，張宗祥校點，《國權》。北京：中華書局，1958。
- 【明】錢嘉徵，《侍御公奏疏》。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第97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 【明】韓邦奇，魏冬點校整理，《韓邦奇集·苑洛集》。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
- 【明】王世貞，魏連科點校，《弇山堂別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臺北：偉文圖書公司，1976。
- 【清】王復禮，《御覽孤山志》。光緒7年〔1881〕錢塘丁氏刻本。
- 【清】甘熙，《白下瑣言》。臺北：廣文書局，1970。
-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十三》。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
- 【清】江左樵子，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樵史通俗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初寫刻本影印。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2015。
- 【清】張廷玉等，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四史·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
- 【清】梁章鉅，《楹聯叢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
-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齋隨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第126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清】陶貞懷，李平編校，《天雨花》。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
- 【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 【清】鄭澧修，《乾隆杭州府志》。乾隆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

## 二、近人論著

### （一）專書

- 〔日〕三田村泰助，吳昊陽譯，《宦官：側近政治的構造》（宦官：側近政治の構造）。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
- 〔日〕伊東忠太，蔡婷朱譯，《中國建築史考察筆記》（見聞野帖『清國』）。新北：楓樹林出版社，2023。

- 〔荷〕田海（Barend J. Ter Haar），王健等譯，《關羽：由凡入神的歷史與想像》（*Guan Yu: The Religious Afterlife of a Failed Hero*）。北京：新星出版社，2022。
- 〔美〕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邵長財譯，《小天命：生祠與明代政治》（*Shrines to Living Men in the Ming Political Cosmo*）。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2。
- 井玉貴，《陸人龍、陸雲龍小說創作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 向楷，《世情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 曲英杰，《孔廟史話》。臺北：國家出版社，2004。
- 何孝榮，《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京：南開大學出版社，2007。
- 何孝榮，《明代南京寺院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 余華青，《中國宦官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吳兆豐，《有教無類：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動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
- 李孝悌，《明清以降宗教城市與啟蒙》。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9。
- 李啟謙，《孔門弟子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87。
- 李惠儀，李惠儀、許明德譯，《明清文學中的女子與國難》（*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the Late-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2。
- 李劍國、陳洪，《中國小說通史：明代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 杜婉言，《倭幸：中國宦官與中國政治》。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
- 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
- 苗棣，《魏忠賢專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 高志忠，《明代宦官文學與宮廷文藝》。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 莎日娜，《明清之際章回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 陳玉女，《明代二十四衙門宦官與北京佛教》。臺北：如聞出版社，2001。

- 黃俊傑，《東亞儒家仁學史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 黃進興，《聖賢與聖徒》。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 董勝，《官學盛況：國子監與學宮的教育》。臺北：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0。
- 廖宜方，《王權的祭典：傳統中國的帝王崇拜》。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
- 熊劍平，《錦衣衛：紅蟒、飛魚、繡春刀，帝王心機與走向失控的權力爪牙》。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9。
- 齊裕焜、陳惠琴，《諷刺小說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
- 劉祚臣，《北京的壇廟文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盧海鳴、楊新華，《南京明清建築》。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 鮑震培，《清代女作家彈詞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

## （二）期刊論文

- 徐濤、劉合心，〈榆林新明樓魏忠賢銅像考〉，《文博》第3期（2002.3），頁69-80。
- 梁紀想，〈〈欽賜重修福田寺碑記〉及魏忠賢生祠〉，《文物春秋》第4期（2006.8），頁69-70。
- 陳時龍，〈明代的敕和敕諭〉，《故宮學刊》第14輯（2015.8），頁171-182。
- 陳學霖，〈明代宦官與鄭和下西洋的關係〉，《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48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頁163-190。
- 傅公鉞，〈清代的太廟〉，《故宮博物院院刊》第3期（2015.8），頁73-79、86。
- 黃進興，〈學術與信仰：論孔廟從祀制與儒家道統意識〉，《新史學》卷五第2期（1994），頁1-82。
- 楊豔秋，〈《明光宗實錄》、《三朝要典》的編修〉，《史學史研究》第4期（1998），頁48-52。

### （三）會議論文

華慈祥，〈明代玉帶形制及相關問題芻議〉，收入上海博物館編，《中國隋唐至清代玉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323-331。

羅元信，〈〈林祭酒拂衣帝里〉——關於「林鈺罷官」的史實、人物與文學作品〉，收入陳益源主編，《2019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門：金門縣政府文化局，2019，頁69-120。

### （四）學位論文

梅碧波，《論明末清初白話小說中的魏忠賢形象》。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8。

郭書瑄，《明末清初「魏忠賢」小說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Du, Wanyan. *Ning Xing: Chinese Eunuchs and Chinese Politics*, Beijing: Oriental Publishing House, 2007.
- Guo, Shuxuan. *Study on the Novels of Wei Zhongxian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aipei: Master's thesis,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09.
- He, Xiaorong.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Buddhist Temples in Beijing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Nanjing: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07.
- He, Xiaorong. *Study on Nanjing Temples in Ming Dynast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0.
- Huang, Jinxing. *collected essays on history and religion*. Taipei: Yunchen Cultural Industry Co., Ltd., 2001.
- Li, Wai-ye. *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Harvard Univ Press, Ltd., 2014.
- Luo, Yuanxin. "Lin Jijiu Fuyi Dili—Historical facts, characters and literary works about Lin Cuo's dismissal from office", included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19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on Southern Fujian Culture*, edited by Chen Yiyuan. Kinmen: Cultural Bureau of Kinmen County Government, 2019, pp. 69-120.
- Schneewind, Sarah. *Shrines to Living Men in the Ming Political Cosmos*,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td., 2018.
- Wu, Zhao Feng. *Education without distinction: A study of the actions of scholar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ies in educating eunuchs*, Bei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Ltd., 2021.

## A study on the narrative of the eunuch's birthplace in novels and note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sieh, Chia-Ying\*

### Abstract

Studies of eunuch narratives in Ming and Qing novels have always focused on Wei Zhongxia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his deeds and images of powerful eunuchs who brought disaster to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The plot of “Lisheng Temple”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ways to create a negative image of eunuchs. However, in the Ming Dynasty, powerful eunuchs such as Liu Jin, Wang Tang, Sun Long, and Liu Jing already had living temples. As the eunuchs became more powerful, the number of living temples also increased to convey authority outside the court. Therefore, the narrative of the eunuchs' living temples has its own importance. Sex,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Ming and Qing novels and refers to notes to explore the presentation, evolu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eunuch's birthplace narrative.

First of all, “the granting of foreheads in the ancestral temple and worshipping in the Confucius Temple” presents a “struggle between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Taoist tradition”. The names of the eunuchs before the Wei ancestral hall who were “granted foreheads by the emperor” are rarely recorded, while the *Book of Accusing Treachery* and The Wei ancestral temples in *Qixian Commentary* and *Tianyuhua* were given by the emperor and had the legitimacy of “political rule”. They were mostly named after Confucian virtues such as benevolence and virtue to highlight the image of “virtuous officials” and “virtuous officials”,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

\*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Chihle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try and “favor” to local people. As for the Wei ancestral temple “consecrated to the Confucius Temple”, it started the trend of setting up eunuch temples next to the Confucius Temple and Taixue. The eunuchs obtained the right to speak of the Confucian “Taoism” and devoted themselves to its image to “turn evil into virtuous people”; and *Warning the World Yin and Yang*, the eunuch temples in “Dream”, *Book of Denial of Adultery*, Popular Novel of Suppression and *Tianyuhua* are mostly located in the capital city, West Lake and other famous places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promoting the power of “eunuchs”.

Secondly, “statues, happy faces and architecture of living temples” deified the image of eunuchs in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official history, “quan eunuchs” were criticized for spending huge sums of money to build living temples and violating the etiquette system, so they were mostly “treacherous/ evil eunuchs”. The negative image of the eunuchs in the novels and notes did not exist for a long time. Most of them were destroyed as they lost power. However, the statues may be preserved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eunuchs because of the image of “virtuous eunuchs” who contributed to the local area. Among the completed buildings, it can be seen from *Book of Denial*, *Xianju Xianping*, *Applause Juechen*, and *Zhenhai Spring and Autumn* that the costumes and accessories of the statues in the temple are inappropriately made of imperial rituals, reflecting the author's criticism of “powerful officials”. The purpose of *Rebuking Adultery* and *Tian Yu Hua* is to continue and strengthen the image of “treacherous eunuchs”, pointing out that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ration of birthplaces and temples were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death of emperors and the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Qing Dynasty added details based on the ancestral narratives in the Ming Dynasty novels, reflecting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of central officials and local officials on whether “power eunuchs” contributed to the local area. Eunuchs and local officials also jointly shaped the wandering between virtuous eunuchs and traitors. The image of evil eunuchs, therefore, by sorting out the presentation and evolution of eunuch birth and temple

---

narratives in Ming and Qing novels and notebooks, we can understand the diversity and significance of eunuch narrativ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words: Eunuch narratives, Wei Zhongxian, living shrines, statues, Ming and Qing novels